

論朝鮮清心丸的流行 與清代遼東社會*

吳政緯**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朝鮮藥品「清心丸」何以風行清代遼東社會。清心丸內分若干品級，「上品」係由朝鮮官方調製的臘藥，朝鮮的國王、將軍、百姓都曾服用，亦是朝鮮燕行使的隨身物品，廣受清朝官員、百姓的喜愛。本文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清心丸在朝鮮國內的意義、朝鮮使節團的醫療編組、以及清代遼東社會的需求。透過朝鮮人的記述，本文將重建清代遼東社會的部分實況，並從在地需求的角度理解清心丸在遼東社會的流行。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指出朝鮮王朝的官員、百姓將清心丸視為療效奇佳的藥品，並梳理了不同階層索求清心丸的景況。其次，分析負責製作清心丸的官方單位，以及調劑清心丸的素材來源，呈現其珍貴性。第二部分則聚焦於朝鮮燕行使的醫療資源，分析不同層級的醫療人員在使節團扮演的角色，並檢視他們在「唐藥」貿易中的角色。第三部分則從遼東地方社會的角度，討論清心丸對於貢道沿途居民的意義。

關鍵詞：清心丸、燕行文獻、中朝關係史、遼東社會、唐藥

* 本文最初以〈起死神丹：朝鮮清心丸的流行與清代東北社會〉為題，2019年4月13日報告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舉辦的「兩岸明清史研究生論壇」。後經修改，2019年10月31日提交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門，作為該所獎助博士生的年度成果報告。兩次報告期間得到與會師長、同學的建議，投稿後蒙審查人斧正，以及名古屋大學程永超博士、東京大學胡華喻學兄、成功大學金妍希學兄惠賜資料，特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此丸若載數車來，萬事應無不可為。

——李肇源（1758-1832），《黃梁吟·清心丸歌》¹

燕京人以清心元為起死神丹，我使入燕，自王公貴人無不聚首來乞。

——金邁淳（1776-1840），《洌陽歲時記·臘日》²

見數三女子，年貌未衰，皆撮髻插花，抱小兒來，懇于前。語雖難解，而可知其求藥，自囊中出清心丸以給之，皆喜而去。

——李遇駿（1801-1867），《夢遊燕行錄》³

一、前言

凡是翻閱過十七、十八世紀燕行文獻的研究者，莫不對「清心丸」印象深刻。清心丸又名清心元、牛黃清心丸、真真的丸子，是朝鮮使者的隨行藥丸，同時也是一種商品、禮物、貨幣，在多種場合扮演溝通人情的角色。朝鮮燕行使自然注意到清心丸在中國異樣的風行程度，嘉慶二十一年（1816）出使的李肇源甚至作〈清心丸歌〉，嘲諷中國上下對清心丸的癡迷，認為若能載來數車，當真是無所不能。不解漢語的李遇駿見到清朝女子，便知她們是求藥而來。遠在國內，未曾燕行的金邁淳亦云，北京居民視清心丸為「起死神丹」，連王公貴人都紛紛求藥，可見它在中國人眼中的特殊地位。

目前關於清心丸的研究可分成兩部分，一是強調其風行清朝

¹ 朝鮮·李肇源，《黃梁吟》（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61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清心丸歌〉，頁311-313。

² 朝鮮·金邁淳，《洌陽歲時記》（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主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1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頁19。

³ 朝鮮·李遇駿，《夢遊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5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頁420。

的景況，多在相關論著中簡單帶過，篇幅並不多；⁴一是聚焦清心丸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定位為文人交際應酬的重要介質，或指出使者在不同場合贈送清心丸具備哪些意涵。⁵至於清心丸在清朝廣受歡迎的原因，僅見中國中醫科學院的李春梅、北京大學的陳明提出解釋。李春梅指出，清心丸藥方源自宋朝，常被用於治療中暑、疫病等急症，因為內中使用人參、牛黃、麝香等藥材，致使價高難求。不過李春梅仍表示，對於朝鮮使者而言，清心丸的外交價值可能更高。⁶

陳明同樣指出清心丸源自宋代的藥方，他將清心丸定義為「普通藥物」，強調清心丸的流行是「朝鮮人士的自我神化過程」，甚至稱這種神化「實際上就是當代最為流行的欺詐手法」。清朝百姓對清心丸的趨之若鶩，陳明歸諸時人「趨附舶來品的心態」，而「不是醫療實用方面的療效問題」。陳明否定清心丸擁有特殊療效，嚴厲地批評清人「把造假之物當作珍貴的寶貝，明知受騙卻還年年情願吃欺」，直指華人盲目推崇舶來品的劣根性。⁷

李春梅、陳明的觀點堪稱迥然有別，前者強調清心丸治療中暑、疫病的功效，以及外交價值高於醫療價值；後者斥責清人崇尚舶來品的心態，認為清心丸不過是普通藥物。本文主張清心丸具有不同的等級，而上品者確實療效出色，不是普通藥物，研究者必須釐清此間的差別，因為文獻上皆表述為「清心丸」。如後所

⁴ 金泰俊僅在174-175頁用一段的篇幅討論清心丸，裴英姬則是三段。參見金泰俊，〈18세기 燕行使의 思考와 자각 —— 《熱河日記》를 중심한 여행자 文 학 論 —— 〉，《明大論文集》，11（首爾，1978.12），頁151-179；裴英姬，〈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34-35。

⁵ 陳明，〈「吸毒石」與「清心丸」——燕行使與傳教士的藥物交流〉，《中華文史論叢》，2009：1（北京，2009.3），頁311-346、頁398。

⁶ 李春梅，〈《燕行錄全集》中的醫學史料研究〉（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46-48。必須說明的是，作者關於清心丸的討論僅兩頁半，並非整篇論文的重心，不過這已是少數用較多篇幅討論此議題的作品。

⁷ 陳明，〈「醫藥反求之於東夷」——朝天使與燕行使旅程中的醫事交往〉，《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4（北京，2013.2），頁77-102、頁478。

示，朝鮮國內對上品的清心丸亦求之若渴，清心丸同時也是幾次朝鮮國王病危之際的進藥首選。

從朝鮮國內的脈絡審視清心丸，有助於揭示朝鮮國內關於清心丸的素材、製作、分配與流通狀況，及其與朝鮮使節團的關係。尤其朝鮮使節團的醫療資源、清代遼東地方百姓的需求，三者相互影響，方才形成清代遼東、北京的「清心丸熱」。再者，既然上品清心丸的療效令人印象深刻，清朝、朝鮮的平民百姓實非唯一的求藥者，滿洲貴族、對馬島島主、日本官員均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清朝皇帝也曾將此做為禮品，賞賜官員。

整個論證的過程，本文將顯著地倚賴朝鮮史料，包含燕行文獻、朝鮮讀書人的筆記與文集、官方的報告書。因為最常向朝鮮使者求藥的群體，是他們朝貢沿路上的遼東居民，而這些人沒能留下太多的資料。管見所及，清代的筆記史料、遼東地區的地方志沒有關於清心丸的記述，清代史料不足以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論清心丸的問題。加上清代實施封禁政策，整個清代記述遼東社會的文獻並不多。再者，求藥的滿洲人如本文提到的索尼（1601-1667）也沒有出版文集，或是留下關於服用清心丸、延請朝鮮醫生的文字。換句話說，探討清心丸的議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必須以朝鮮史料為中心，輔以中國史料，並批判地閱讀朝鮮史料，避免可能的錯誤。本文擬綜合朝鮮、清朝的文獻，力圖從朝鮮使者的視野中，捕捉這群生活在中國遼東的居民，分析清心丸在他們眼中的意義。

總而言之，本文試圖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清心丸，而這具體涉及朝鮮社會中的清心丸、朝鮮使節團的醫療編制，以及清代遼東地方社會與使節團的關係。以下討論將從朝鮮往清朝前進，重建清心丸成為「起死神丹」的歷程。

二、朝鮮名藥清心丸

與中國相同，朝鮮國王時常在臘月（農曆 12 月）頒賜「臘

藥」給臣子，⁸這除表示榮寵外，也代表朝廷的年終慰問。⁹按照慣例，朝鮮王朝最高醫療機關「內醫院」負責製作臘藥，而清心丸正列名首位。活躍於朝鮮純祖（1790-1834，1800-1834 在位）時期的洪錫謨（1781-1857）撰有一本記載朝鮮年中行事的《東國歲時記》，他明確指出臘冬時節，「內醫院造丸劑各種以進，名曰臘藥，頒賜近密。清心元主憫塞，安神元主熱，蘇合元主癰，三種為最要」。¹⁰

洪錫謨是蔭任出身的地方官員，層級並不高。¹¹配合位居中樞要職的金邁淳的觀察，能更清楚地說明臘藥的內涵，其《洌陽歲時記》載：「內醫院及諸營門以臘日製諸種丸劑，公私、京鄉無不波及，而清心元、蘇合元最有奇效。」¹²綜合這兩條記述，可證儘管有其他衙門參與調製臘藥，主要的執行單位仍是內醫院，而臘藥則多指清心丸、蘇合丸。

雖然臘藥涵括約 30 種到 40 種藥品，但清心丸一直居於首位。先看一般民眾較容易接觸的文本，如《考事撮要》、《考事新書》，兩者均將清心丸列為臘藥第一種。¹³《考事新書》的作者徐命膺

⁸ 在傳統中國，這個現象至少能夠追溯到唐代，參見劉淑芬，〈戒律與養生之間——唐宋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藥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臺北，2006.9），頁 357-400。清朝皇帝也會頒賜藥品給官員，如錠子藥，參見李曉華，〈《紅樓夢》中宮廷錠子藥賞賜之俗考〉，《紅樓夢學刊》，2016：4（北京，2016.7），頁 289-299。

⁹ 朝鮮·柳得恭，《京都雜志》（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主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1 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頁 29；申東源著，任正燦譯，〈救急名藥·牛黃清心丸〉，收入申東源著，任正燦譯，《コレラ、朝鮮を襲う：身体と医学の朝鮮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15），頁 215。原文初出：申東源，〈臘藥，『언해남약증치방』，그리고 허준〉，《한국의사학회지》，13：2（首爾，2000.11），頁 23-28。

¹⁰ 朝鮮·洪錫謨，《東國歲時記》（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主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1 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頁 47。

¹¹ 朝鮮·洪錫謨等著，姜在彥譯註，《朝鮮歲時記》（東京：平凡社，1971），〈解說〉，頁 277。

¹² 朝鮮·金邁淳，《洌陽歲時記》，頁 18-19。

¹³ 朝鮮·魚叔權，《考事撮要》（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3 輯》，子部第 10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425-426；朝鮮·徐命膺，《考事新書》（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3 輯》，子部第 11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卷 15，〈醫藥門〉，頁 67。

(1716-1787)有感於「達官窮儒、大人小民」猝遇急症，不清楚用藥之法，因此抄錄醫書救急之方，供讀者以備不虞。¹⁴徐命膺在該書〈醫藥門〉先介紹諸藥食忌，算是用藥提醒，而在實際施藥的部分，第一個就提到清心丸，顯見其重要性。他的敘述基本上抄錄自朝鮮內醫院醫官許浚（1537-1615）的見解，¹⁵如後所示，清心丸一直是內醫院的重要用方。

內醫院是少數在藥材儲備、調製技術上符合條件，能夠製作臘藥的衙門。內醫院負責照顧朝鮮國王，掌握全國最豐富的醫療資源。藥材方面，總計朝鮮各地上貢的國產藥材，以及從中國輸入的唐藥共 305 種，¹⁶均收貯內醫院。技術層面，內醫院轄下專職診療的醫師便達 38 名，加上管理藥材、製作文書，處理行政業務等員，約 140 餘人。¹⁷由此可見臘藥的身價不凡，這是一種倚靠朝鮮官方的行政輸配體系方能成藥的產品。

由內醫院為主的衙門調劑臘藥，引出一個問題，即前輩學者筆下的「普通藥物」，效用至多治療「中暑、疫病等急症」的清心丸，何以需要勞煩中央單位專職處理。解開問題必須先釐清朝鮮清心丸的由來，尤其是分疏宋代局方與朝鮮國內的脈絡。前人研究已指出，清心丸可追溯宋代太醫院的《聖濟總錄》，不過當時並未使用人參、牛黃。李春梅強調只有徐春甫（1520-1596）的《古今醫統大全》、張璐（1617-?）的《張氏醫通》採牛黃入藥，判斷朝鮮藥方與此二者較接近。¹⁸

¹⁴ 朝鮮·徐命膺，《考事新書》，〈凡例〉，頁497。

¹⁵ 徐命膺：「治不語、恍惚煩鬱、痰熱、傷寒發熱、心氣不足、神志不定，一切病發熱等證。」許浚：「治中風不語、恍惚煩鬱、痰熱、傷寒發熱、心氣不足、神志不定，一切病發熱等症。」參見朝鮮·徐命膺，《考事新書》，卷15，〈醫藥門〉，頁67；朝鮮·許浚，《臘藥症治方諺解》（首爾：大提閣，1985），頁561。《臘藥症治方諺解》一書，本文採用的書名是正文卷首的稱法，不是封面的書名，特此說明。

¹⁶ 唐藥，又作唐藥材，有時可以相互指稱，指產於中國的藥材。

¹⁷ 關於朝鮮內醫院的編制及職責，請參見申東源著，任正燦譯，〈內醫院·典醫監·惠民署はどのような所だったのか〉，收入申東源著，任正燦譯，《コレラ、朝鮮を襲う：身体と医学の朝鮮史》（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5），頁177-199。

¹⁸ 李春梅，〈《燕行錄全集》中的醫學史料研究〉，頁47；陳明，〈「醫藥反求之於東夷」——朝天使與燕行使旅程中的醫事交往〉，頁86。

事實上，根據宋朝官方編纂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其中收錄的清心丸配方同樣使用牛黃、人參、麝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箔」，需要 1,200 箔。¹⁹明人李梴（嘉靖萬曆年間人）的《醫學入門》影響朝鮮醫學極深，²⁰該書關於牛黃清心丸的記載同見牛黃、人參、麝香、金箔等藥材。²¹與其舉《古今醫統大全》、《張氏醫通》等醫籍為證，不如思考《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醫學入門》等書在朝鮮的影響。不論如何，中國與朝鮮在清心丸的配方上，差異並沒有想像中大。

許浚是朝鮮後期供職內醫院的醫官，由他編纂的集大成醫書《東醫寶鑑》刊刻於 1613 年，係研究朝鮮醫療史的重要古籍。《東醫寶鑑》調配牛黃清心丸的方子採用牛黃、人參、麝香、龍腦、金箔等高價藥材，其中金箔的比例應是遵循龔信的《古今醫鑒》。²²許浚給予清心丸很高的評價，稱此方「治卒中風、不省人事、痰涎壅塞、精神昏憤、言語蹇澁、口眼喎邪、手足不遂等症」。²³明顯是治療中風，以及昏迷、不省人事的重症治方。

1799 年，內醫院首醫康命吉（1737-1801）奉王令，以《東醫寶鑑》為藍本，纂成《濟眾新編》。《濟眾新編》卷首第一味即「牛黃清心元」，藥效、配方一準《東醫寶鑑》，顯然清心丸到十八世紀末仍未過時。²⁴上舉二書是全部以漢字書寫的醫籍，預設讀者是當時的知識菁英，不過朝鮮百姓亦明瞭清心丸的療效。許浚曾運

¹⁹ 宋·太平惠民和劑局編，劉景源點校，《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卷1，〈治諸風附腳氣·牛黃清心圓〉，頁7-8。

²⁰ 三木榮，《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明医学の影響〉，頁305-311。

²¹ 明·李梴著，金媽莉注，《醫學入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外集，卷6，〈雜病用藥賦〉，頁491-492。

²² 明·龔信纂輯，龔廷賢續編，羅青江整理，《古今醫鑒》（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卷16，〈通治·牛黃清心丸〉，頁297。

²³ 朝鮮·許浚著，郭靄春注，《東醫寶鑑》（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卷2，〈雜病篇·風·牛黃清心元〉，頁408。

²⁴ 朝鮮·康命吉，《濟眾新編》（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1輯》，子部第2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1，頁26。

用漢字、諺文雙軌撰寫《諺解臘藥症治方》，卷首第一方即牛黃清心元。許浚除重複《東醫寶鑑》的記述外，還補充說此方「治中風不語、恍惚煩鬱、痰熱、傷寒發熱、心氣不足、神志不定，一切病發熱等症」。²⁵顯然清心丸能夠治癒所有的熱症。

這種由朝鮮官方製作的清心丸能救治不省人事、處於昏迷狀態的患者，在朝鮮國內被視為急救良方。²⁶例如：朝鮮國王在命危之際，內醫院通常選擇清心丸應急。朝鮮開國者李成桂（1335-1408）死前即曾進清心元、獨參湯；²⁷朝鮮文宗李昀（1414-1452，1450-1452 在位）大漸前夕，當時的首陽大君李瑈（1417-1468，1455-1468 在位）甚至痛哭外庭，詢問何不進清心元？²⁸一直到十七世紀，朝鮮孝宗李㷞（1619-1659，1649-1659 在位）病中危急，內醫院仍選擇進清心元。²⁹幾次朝鮮國王的危急時刻，清心丸都是內醫院首選的起死神丹。

壬辰倭亂期間（1592-1598），朝鮮將軍李忠吉力戰終日，導致昏渴，其弟表示「吾兄氣絕，願得清心元」。³⁰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清國天津地方百姓 29 人因風漂流全羅道茂長縣，其中一位名為羅五的漂人隨朝鮮使節團解送回清朝的途中，奄奄一息，朝鮮使節團立即「以清心元及相當藥物多般救療」。³¹以上案

²⁵ 朝鮮·許浚，《臘藥症治方諺解》，頁561。

²⁶ 關於牛黃清心丸在朝鮮的流行，乃至「濫用」（abuse），相關研究請參見Kim Seong Su, "From Woohwang Cheongsimwon to Ginseng -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Use in the Joseon Era -,"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6 (Aug, 2017), pp. 147-180；申東源著，任正燦譯，〈救急名藥·牛黃清心丸〉，頁215-224。

²⁷ 朝鮮·孟思誠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第1冊，卷15，頁441，太宗八年五月壬申條。

²⁸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文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第6冊，卷13，頁491，文宗二年五月丙午條。

²⁹ 朝鮮·李景奭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孝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第36冊，卷21，頁191，孝宗十年五月甲子條。

³⁰ 朝鮮·奇自獻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第22冊，卷73，頁656，宣祖二十九年三月辛未條。

³¹ 朝鮮·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24輯，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冊2，原編，卷73，〈漂民八·報茂長漂人中一名病故咨〉，頁1399。關於漂人如何從朝鮮送還清朝，相關研究參見劉序

例皆見朝鮮君臣對於清心丸的重視。

很幸運地，透過李文樅（1494-1567）的《默齋日記》，吾人得以更細緻地觀察朝鮮人如何使用清心丸。李文樅懂醫理，《默齋日記》因此留下不少診療病患的回憶。根據他的記述，病人命危之際，時見「急求清心元」的敘述。³² 1557年，當地某位生員「吐血二鉢，溺血亦多，氣絕云云，求藥甚急」，李文樅便投以清心丸救治。³³

正因為清心丸是「活人緊要之藥」，³⁴它不僅成為朝鮮宮廷的急救良方，同時也是庶民求之若渴的靈藥。十五世紀中葉，朝鮮的中央秘書機構「承政院」曾上奏，「世人不察病根，若患急病，則皆用清心圓」，朝鮮民眾將清心丸當作萬用藥，任何急病皆循此應急。後來甚至出現市井之輩私自配劑牟利，無怪乎承政院陳請「京外公私各處，清心圓劑作，一皆禁斷」。希望一律由中央單位惠民署、典醫監處理。³⁵

官方禁止民間私自劑作，肇因部分藥價過高，民間有人用小腦代替龍腦，致使「殊失藥性，有害無益」，³⁶良藥反而變成毒藥。龍腦又稱冰片、羯婆羅香，指的是龍腦香科的樹脂，主治目翳、頭痛。小腦則是樟腦的提煉物，因為樟樹也能產生樹脂，價格較龍腦便宜許多，百姓因此取巧代以入藥。³⁷調配清心丸的材料

楓，〈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故宮學術季刊》，23：3（臺北，2006.9），頁91-126。

³² 朝鮮·李文樅，《默齋日記》（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41輯，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冊上，頁544。

³³ 朝鮮·李文樅，《默齋日記》（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41輯），冊下，頁210。

³⁴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第4冊，卷94，頁383，世宗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午條。

³⁵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4冊，卷91，頁324，世宗二十二年十一月辛酉條。

³⁶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4冊，卷91，頁324，世宗二十二年十一月辛酉條。

³⁷ 朝鮮·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首爾：東國文化社，1959），卷11，〈沈腦辯證說〉，頁375-376。

所費不貲，牛黃、人參、麝香都是取得不易的珍貴藥材；部分藥材則需從中國買來。³⁸這充分說明何以主要由內醫院、中央部會附設的藥房製作臘藥，因為內醫院是統籌全國醫藥資源的最高機關，而內醫院、中央部會的藥材則源自各地的貢賦。³⁹例如清心丸中摻用的蒲黃，都是由朝鮮各道上貢籌集。⁴⁰

一般印象中人參是朝鮮特產，事實上朝鮮官方為保證產量穩定，強迫邊區產地年年上繳，造成龐大的負擔。百姓為完糧納稅，甚至鋌而走險，跨越國界盜採人參。⁴¹朝鮮官方曾於1718年下令減貢，降低百姓的負擔，卻很快改回舊章。畢竟朝鮮關東地區山巒疊翠，以產參聞名國中，朝廷固定收取60斤的人參，專作臘藥之資。此類官員口中的「臘參」是驚人的利益，曾任內醫院提調的閔鎮厚（1659-1720）坦承，人參苗種漸稀，採取絕艱，提議「首罷臘封，創立新規」，並減臘參10斤，往後「人參、牛黃之屬，隨用會計」，卻遭國王否決。⁴²因為臘藥如清心丸，人參是不可或缺的藥引，結果是貢上的人參不如預期，地方官便遭罷黜，臘藥專用的人參繼續徵之民間。⁴³

必須說明的是，此類貢納朝鮮官方的人參，並非一般常見的、得以栽種培養的品種，而是產於郊外的野山參。儘管行文、

³⁸ 刁書仁，〈明代朝鮮使臣赴明的貿易活動〉，《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長春，2011.6），頁73-79；申東源著，任正嫻譯，〈救急名藥·牛黃清心丸〉，頁215-224。

³⁹ 田川孝三，〈《李朝貢納制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64），〈進上考〉，頁156。

⁴⁰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3冊，卷63，頁541，世宗十六年一月戊申條。

⁴¹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山本進，〈《大清帝國と朝鮮經濟——開發・貨幣・信用——》〉（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2014），〈平安道江界府における參政〉，頁63-86；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邊境：明末清初東亞邊界的人參問題〉，頁51-80。

⁴² 朝鮮·金昌集等修，〈《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第41冊，卷62，頁29，肅宗四十四年七月戊辰條。

⁴³ 朝鮮·李秉模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8），第45冊，卷12，頁281，正祖五年十一月辛亥條。

口語上往往統稱「人參」，實際上種類繁多，藥效、價錢差異頗大。此類產於邊區，數量稀少的「藥蔘」最為珍貴，因此前述的「臘蔘」每年僅上繳 60 斤，不是因為朝鮮缺乏人參培育場，而是本就無法人工種植藥效頂級的野山蔘，這也說明何以貫穿清代的中朝關係史，越界採蔘係雙方密切關注的事項。一則從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初，人參的價格不斷攀升；⁴⁴二則囿於中朝之間的邊禁，當中、朝某一方蔘種斷絕後，唯一的出路是向對方求援，印象中的人參大國朝鮮便曾向清朝尋求協助，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云：

朝鮮國王為請買藥蔘事。內醫院啓稱，本院藥蔘，比來絕種，無以繼用，委屬悶慮。移咨。買藥已有前例，照此申請，允為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當職為照所據。藥蔘固本國罕有之產，而去年秋隕霜太早，極葉盡脫，無地採取，凡有劑藥，每患缺材，雖欲乞買而貴部苟不轉聞，許令和賣，則上國市肆之物有不敢擅自買來者。竊稽順治十年，本國以藥材之乏絕，咨請買用，幸蒙開許。今此人蔘濟人死命，乃藥材之不可闕者，謹援舊例，有此申請，煩乞貴部俯諒轉奏，許今換買，不勝幸甚。⁴⁵

此類朝鮮罕有的藥用人蔘，蓋救人性命的緊要之方，藥蔘絕種之際也只能向清朝求取。藥蔘如此珍稀，關心者自然不僅止於清朝、朝鮮兩國，日本便數次懇求。⁴⁶人蔘之可貴，甚至令江戶幕府意識到必須施行人蔘國產化，以免大量貨幣金屬外流。⁴⁷

⁴⁴ 關於人參的價格變化，請參見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消費：人參的價格、貿易與流通〉，頁170-237。

⁴⁵ 朝鮮·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24輯），冊1，原編，卷47，〈交易三·請買人蔘咨〉，頁896。清朝禮部則以「人蔘係該國所產」為由拒絕，禮部的回咨見同書，同卷，頁898。

⁴⁶ 此處僅舉二例為證，參見朝鮮·禮曹典客司編，《邊例集要》（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16輯，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74），冊下，卷12，〈求買〉，頁229、頁247。

⁴⁷ 田代和生，《江戶時代朝鮮藥材調查の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人參、牛黃尚屬朝鮮境內可得的藥材，貧寒之人卻早已「困於牛黃」，偏偏「牛黃所用之處，只清心元」，⁴⁸平民百姓根本無力購買，更遑論必須倚靠官方朝貢方能獲致的「唐藥」。1433 年，典醫監提調黃子厚（1363-1440）表示，「唐藥，遐方難致，價重之物，貧民之尤所難得也」。⁴⁹明言民間取得唐藥之難。清心丸摻用唐藥，大幅提高調劑成本。1432 年、1433 年，朝鮮官方即承認「我國所產已足矣，然唐藥鮮少」，⁵⁰「我國偏在海隅，藥材不產」。⁵¹載錄朝鮮醫書的方藥，必須求諸中國，清心丸正是其中之一。

清心丸的珍稀源自諸多材料的取得不易，除前述幾種外，還有黃金。受限於當時的開採技術，朝鮮並不採金，朝鮮官員便曾明言「我國本無金山取用之地，在前段，自中原買來，作金箔劑清心元」。⁵²宗主國明朝亦清楚朝鮮不產黃金，特別免除朝鮮進貢黃金的義務，大明朝廷表示「金玉非爾國所產」一語可為證。⁵³如前所述，清心丸需用金箔為衣，一丸費 120 箔，故朝鮮議政府表示「今清心元，活人緊要之藥，而難於用金」。連朝鮮政府都感到困窘。朝鮮甚至需要透過日本取得黃金、龍腦，⁵⁴無怪乎朝鮮官方體

1999)；田代和生，〈「鎖國」時代の日朝貿易——銀の路・絹の路——〉，《經濟史研究》，14（大阪，2011.1），頁 1-24。

⁴⁸ 朝鮮·李芑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第 17 冊，卷 63，頁 50，中宗二十三年十月壬寅條。

⁴⁹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 3 冊，卷 60，頁 481，世宗十五年六月壬午條。

⁵⁰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 3 冊，卷 58，頁 421，世宗十四年十月乙巳條。

⁵¹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 3 冊，卷 61，頁 501，世宗十五年八月丙午條。

⁵² 朝鮮·禮曹典客司編，《典客司日記》（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各司謄錄》，第 92 冊，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99），冊 1，頁 22，仁祖十八年庚辰五月十九日。

⁵³ 明·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63，頁 1492，宣德五年二月癸巳條。

⁵⁴ 朝鮮·慎承善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第 11 冊，卷 248，頁 678，成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甲戌條；朝鮮·李芑等修，

察民情，於 1440 年調降惠民局的藥價，仍表示「今後最貴，清心元、蘇合元、保命丹」，⁵⁵清心丸自然不是平民百姓易得的藥品。

這種由朝鮮官方傾力調製的清心丸，問世後被頻繁地贈送鄰邦外國，受到喜愛。早在朝鮮立國之初，1405 年，朝鮮議政府官員金尚琦便曾前往慶源一帶，冊封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1370-1433），賜與印信一顆，以及「清心元十丸、蘇合元三十丸」。⁵⁶日本方面更是求藥不斷，1418 年，對馬島主宗貞茂（?-1418）遣人求藥，懇請「將清心元、蘇合元諸般藥材，付伴人送之」。⁵⁷迄 1609 年、1660 年仍得見對馬島方面索求清心丸的記述。⁵⁸對馬島對清心丸的需求，最終促使朝鮮通信使將清心丸作為固定贈送的禮品。根據《增正交鄰志》收錄的禮物清單，定例奉送對馬島主清心元 10 丸。⁵⁹直至十九世紀，清心丸都是朝鮮官方禮單上的必備品，1811 年，柳相弼（1782-?）贈送日方 10 粒清心丸；⁶⁰1877 年，朝鮮國則贈送日本外務大臣清心元 100 丸。⁶¹

來往於北京、漢城的朝鮮燕行使，隨身攜帶的正是官方調製的清心丸。譯官是使節團的必備成員，也是實際參與使團事務的

《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第 16 冊，卷 48，頁 240，中宗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丁卯條。

⁵⁵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 4 冊，卷 90，頁 307，世宗二十二年七月戊辰條。

⁵⁶ 朝鮮·孟思誠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 1 冊，卷 9，頁 319，太宗五年二月己丑條。

⁵⁷ 朝鮮·孟思誠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 2 冊，卷 35，頁 209，太宗十八年三月甲子條。

⁵⁸ 朝鮮·禮曹典客司編，《邊例集要》（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 16 輯），冊下，卷 12，〈求貿〉，頁 202、頁 219。

⁵⁹ 金健瑞、李思恭、林瑞茂等編，李漢紀、李哲懋、吳致默等增補，《增正交鄰志》（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4），卷 5，〈三使臣私禮單〉，頁 241。

⁶⁰ 朝鮮·柳相弼，《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編，《海行摺載》，第 10 冊，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私禮單物種〉，頁 333。

⁶¹ 朝鮮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編，《李朝實錄·高宗實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卷 14，頁 504，高宗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直到二十世紀初，日本方面仍然認為朝鮮人參是「世界上最好的」，並指出京畿道、平安道、全羅道、忠清道為佳，上品、下品價差五倍。參見荒川五郎，《最近朝鮮事情》（東京：清水書店，1906），〈朝鮮人參〉，頁 216-219。

第一線工作人員。根據《通文館志》記載，朝廷提供的路費，包含衣物、木棉、布疋，以及清心丸。⁶²著名的朝鮮使者洪大容（1731-1783）曾向清朝儒生嚴誠（1733-?）、潘庭筠（1742-?）解釋道：「清心丸頗有奇效，而品亦多等，假者過半。其真者則只出於宮劑，此最可用。」⁶³朝鮮貢使是清代遼東地區少數持有最上等清心丸的旅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造訪中國的李田秀（1756-1795）曾向瀋陽讀書人張裕昆表示，近來朝鮮僕役帶來的清心丸藥效不佳，而他身上的則是朝鮮國王御賜者。⁶⁴基於上述脈絡，朝鮮使者除了是履行外交義務的事務官，同時也是一個移動的、珍貴的「急救箱」。

三、朝鮮使節團的醫療資源

論及朝鮮使節團的醫療資源不免感到弔詭，這是一個擁有「唐藥製品」，卻又必須前往清朝採購唐藥材的任務編組。朝鮮的醫學知識源自中國，諸多藥方必須使用不產於國內的唐藥，比如「朱砂、龍腦，雖曰貴藥，求之中國則猶可得也」。⁶⁵事實上犀角、牛黃、麝香、龍腦、硃砂、胡椒、乳香皆須仰賴中國供應，時至今日，韓國人的甘草根仍主要倚靠中國。⁶⁶清心丸便需要牛黃、麝香、龍腦調製，而此類貴藥絕大部分從中國進口。揀選藥材需要專業素養，非常人所能及，加上使團成員多至三百餘人（此為包含下人僕役後的數字），不乏高官顯貴參與其中，醫員遂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則方便採買藥材，一則解決使團上下成員的

⁶²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冊上，卷3，〈京外路費〉，頁103。

⁶³ 朝鮮·洪大容撰，鄭健行點校，《乾淨衙筆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70。

⁶⁴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冊下，頁402。

⁶⁵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3冊，卷58，頁421，世宗十四年十月乙巳條。

⁶⁶ Soyoung Suh, *Naming the Local: Medicine, Language, Identity in Korea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 p. 24.

疾患。

每一次使行都曠日費時，僅路程即須40日到50日，抵達北京後，一行人按例入住中國官方準備的接待所「會同館」，停留約40日到60日。時日一久，水土不服，使團成員難免患病。此外還有各種緊急突發狀況，例如：1451年，聖節使朴以昌在使行途中「佩刀自刎」，有賴醫官救治。⁶⁷同時也不乏染病漸重，乃至物故者。1647年，副使閔聖徽（1582-1647）病歿會同館，越一年，正使李行遠（1592-1648）未出國門便殞命義州，使行病故之例並不少見。⁶⁸

為解決上列問題，朝鮮使節團配有專責人員，負責買藥求方、治療行人。⁶⁹從明代開始，醫員就是使團的固定成員。儘管因為壬辰倭亂、丁卯胡亂（1627）、丙子胡亂（1636），十七世紀中葉以前的朝鮮文獻，尤其官方檔案亡佚不少，但透過後來編纂的成品，仍能重建一些十四至十七世紀的規制。1771年出版的《考事新書》的〈行人門〉便收錄明代使行的記錄，如〈皇明詔使迎接儀〉、〈皇明進貢路程〉、〈皇明各省道里〉等。藉由其中〈皇明進貢使价〉的記述，能大致還原明朝時期的使團編制：

（朝鮮）國初，歲遣朝宗之使，有冬至、正朝、聖節、千秋四行。謝恩、奏請、進賀、陳慰、進香等使，則隨事差送。使或二員、一員，而不限品；從事官或多、或少，而無定額。……。又有堂上官、通事，仍居從事官之上，而

⁶⁷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文宗實錄》，第6冊，卷9，頁436，文宗元年九月甲寅條。

⁶⁸ 朝鮮·丁若鏞，《事大考例》（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卷22，〈使行病故例〉，頁455-476。

⁶⁹ 關於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朝鮮使節團的成員組成，參見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卷3，〈事大·赴京使行〉，頁85-94。根據《通文館志》，醫員是使節團的固定成員。關於使節團出使的目的方面，參見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綜考〉，《震壇學報》，29、30（安養，1966.12），頁435-480；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宗藩關係之建立及其規制〉，頁15-24；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使行的種類和任務〉，頁28-41。

從事官自教誨譯官以下各有名目外，有醫員、寫字官、畫員共四十餘員。⁷⁰

明代朝鮮使節團的任務編組，例行故事有四，分別是應時而出的冬至、正朝使，以及恭賀皇帝、太子的聖節、千秋之行。此外又有臨時編組，或謝恩，或奏請，隨事方起。使節團的核心是正使，代表朝鮮官方處理外交問題，堂上官、從事官則是副手與行政人員。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技術官僚」，包含醫員、寫字官，以及畫員，人數達40餘名。

1637年，朝鮮的宗主國從大明變成大清，此後使行名目或有更迭，但基本上承續明代的任務編組。通文館是朝鮮王朝「專掌事大交鄰」的單位，⁷¹事大指的是中國，交鄰則是日本。《通文館志》記載該單位的歷史與行政規章，其中收錄諸多使節團與中國交聘的公文範本、禮物清單、道路行程，以及各種使行的成員編制。順治二年（1645），清廷考量到朝鮮「路道遙遠」，為減輕朝貢的負擔，「并三節及歲幣為一行，而必備使、副使、書狀官三員，名之曰冬至使」。⁷²此後除特別的任務編組外，例行朝貢一年一次，冬至使堪稱使節團的典型。

根據中朝往來的重要制書《通文館志》，醫員是冬至使行的固定班底，由典醫監、惠民局輪流派員赴京。⁷³其他名目的赴京使行，醫員同樣參與其中，例如謝恩之行，除以大臣或正一品宗班擔任正使，從二品的官員擔任副使外，隨行有通事、寫字官、醫員。正使的地位不凡，朝鮮國王特別派遣「御醫二員」，即內醫院的成員陪同。⁷⁴如1677年，相當於最高行政首長的領議政許積（1610-1680）赴燕，國王下令，御醫外又「加送針醫一人」，方便照料許積。⁷⁵此外，進香使、問安使之行也能發現醫員、御醫的身

⁷⁰ 朝鮮·徐命膺，《考事新書》，卷7，〈行人門〉，頁604。

⁷¹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卷首，〈《通文館志》序〉，頁3。

⁷²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卷3，〈事大·赴京使行〉，頁86。

⁷³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卷3，〈事大·赴京使行〉，頁89。

⁷⁴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卷3，〈事大·赴京使行〉，頁91。

⁷⁵ 朝鮮·金昌集等修，《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第38冊，卷6，頁344，肅宗

影。⁷⁶不僅如此，使團中配有醫員專用的馬匹，負責載運藥材。⁷⁷從制度設計的層面看，朝鮮使節團的醫療資源充沛，幾乎都有醫員隨行，層級高的官員代表赴京時，更能配得御醫二員。

《燕行錄全集》所見的醫員，總計約 70 名到 80 名，包括御醫、針醫、醫官、醫員、醫女等，種類繁多。⁷⁸對於他們而言，採買唐藥材是極其重要的目標。唐藥必須外求，不是供輸穩定的料材，匱乏乃至用盡的消息時有所聞。1433 年，承政院提醒「唐藥已盡，不獲已，當貿易於中朝」，⁷⁹表示唐藥材用盡後，當向中國買來。1620 年，朝鮮國王光海君李瑄（1575-1641，1608-1623 在位）焦慮「自明年，只聖節、冬至兩行赴京，而翌年春回還，則明年臘藥勢未及劑矣」。光海君擔憂，待明年赴京使行返鄉，趕不及調劑臘藥，遂下令今年的使行多貿唐藥而來。⁸⁰

一直到清代，此番求藥材於人的場景仍不斷上演。1660 年，李元禎（1622-1680）擔任謝恩使行的書狀官，他們本沒有特別的貿易藥材規劃，豈料 2 月 18 日（陰曆）義州將官急報而來，「一行驚怪，莫知所以」，一問之下才知道，朝鮮顯宗李柁（1641-1674，1659-1674 在位）眼疾猝重，「右眼初不視物，左眼隨之而不明」，因此命使團急貿「空青」回國。空青是一種青藍色的礦石，主治明目、去翳，故李元禎稱「治眼聖藥，莫如空青」。不過空青僅產於中國益州及信州，而中原此物亦甚稀貴，旁求而不可得，唯向清朝禮

三年一月癸巳條。

⁷⁶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卷3，〈事大·赴京使行〉，頁92-93。

⁷⁷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卷3，〈事大·行中舉行文書〉，頁97-98。

⁷⁸ 這個數字綜合了李春梅、陳明的資料，參見李春梅，〈《燕行錄全集》中的醫學史料研究〉，頁25-33；陳明，〈「醫藥反求之於東夷」——朝天使與燕行使旅程中的醫事交往〉，頁88-94。

⁷⁹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3冊，卷61，頁501，世宗十五年八月丙午條。

⁸⁰ 朝鮮·尹昉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第33冊，卷54，頁346，光海十二年十月癸丑條。

部陳情，協助購買。⁸¹

1717 年，朝鮮肅宗李焞（1661-1720，1674-1720 在位）亦苦於眼疾，自稱「疾病沈綿，今自五載，加以眼患。醫言空青治目疾奇驗。此乃絕貴之藥，欲貿求於上都」。派遣內醫院醫官李時弼前往中國「請貿空青」。因為「空青非尋常藥材可比，應令（清朝）太醫院挑選能辨別真假之醫人，並伊醫官一同揀擇購買」。最後清朝有鑑於朝鮮國王安靜奉法，贈送空青，方結此案。⁸²由此可見珍稀的唐藥材，朝鮮官方仰賴使節團入手。

唐藥材是製配臘藥的必需品，至關重要，朝鮮中宗李懌（1488-1544，1506-1544 在位）曾言，「內醫院臘藥材，前則赴京醫員，越江即時上來，故可以用之」。⁸³幸好這一年及時貿來唐藥，否則臘藥勢將難產。官方為保障採購順利，在制度上也有所安排，例如命醫員「唐藥材貿易時，次上通事，同力貿易」。⁸⁴要求通事協助不懂漢語口說的醫官購買唐藥材，顯見重視的程度。

直到 1856 年，朝鮮戶曹仍苦於蒐羅唐藥，於是在一份上陳朝鮮國王的報告書《唐藥材契變通節目》，明言貿易唐藥之事，「貢弊敗難支之狀，一世所共知，亦朝家所悉燭也」。尤其唐藥材價高，清朝藥商刻意抬價，「最甚者價之十倍、五倍，此捨絕種者，許多如此」。朝鮮使節團成員也可能牟利自私，稱藥材絕種，低本收購卻謊稱高價，更甚者將劣品、無用之物高價貿來。種種弊病使得戶曹的官員擔憂唐藥可能斷絕，「則從今以後拱手待死」而已。戶曹官員在奏書中開列 19 種價高的唐藥，清心丸的藥引之一麝香便廁身其間。⁸⁵

⁸¹ 朝鮮·李元禎，《燕行錄》（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2016），頁27-28。

⁸² 朝鮮·丁若鏞，《事大考例》，卷17，〈徵賜考·藥材宣賜例〉，頁217-219；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74，頁685，康熙五十六年九月己巳條。

⁸³ 朝鮮·李芑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第18冊，卷89，頁232，中宗三十三年十一月戊戌條。

⁸⁴ 朝鮮·金在魯等編，《續大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8），〈禮典·雜令〉，頁263。

⁸⁵ 朝鮮·戶曹編，《唐藥材契變通節目》（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唐藥價高若此，有時醫官出於私心，意圖牟利；有時北京藥商未能及時備貨，朝鮮國內的唐藥材便可能用罄。1533年，戶曹上奏，通事、醫員購入唐物卻不納府，而醫員倘不繳藥材「則醫司藥材，今方俱絕」，情況緊迫，畢竟「御藥所用尤切，不可以他物代用」。⁸⁶為防止此類情事橫生，官方只好下令「赴京醫院、通事等，所買唐藥材不準數者，及題名外他藥材買來者，啓聞科罪」，⁸⁷採買唐藥材不足數者，及購買非指定藥材者，必須擬罪問責。另一方面又擔心醫員學藝不精，1478年，朝鮮成宗李娐（1457-1495，1469-1494在位）直言：「前此赴京醫員率皆庸劣，故買來藥材多不精善」。⁸⁸可知朝鮮官方著實嚴格管理使團的醫療編組。

此類載諸中央文書的典章規制不是空言，歷次的使節團基本上循此實踐。儘管利用燕行文獻討論醫療議題，存在三種缺陷，但仍是少數能考察制度運行的機會。第一個缺陷是，目前得見的文本以明萬曆年間（1573-1620）及其之後為主，晚明之前的狀況並不明朗，只能考諸《朝鮮王朝實錄》等層級較高的文獻。第二則是燕行文獻的作者絕大多數是士人、官員，而不是醫員，加上他們關心的重點各異，不一定留下相關記述。第三，燕行文獻的作者大部分是使節團的正使、副使、書狀官，以及隨行的子弟軍官。他們通常出身兩班名門世家，經由官方選拔、官員推薦而出行，不是一般的讀書士子。研究者應注意到某些朝鮮使者認為清心丸易得，甚或誇耀性的描述，與他們在朝鮮國內的身分與地位有關。

藏筆寫本，1856，收藏記號奎19337）。本書不著頁碼，這一段的引文全出自該書。另，管見所及，中文世界最早利用此文獻者是張存武，惟張氏僅抄錄藥材名稱，未曾利用此份文書中的見解，特此說明。參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144-145。

⁸⁶ 朝鮮·李芑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第17冊，卷74，頁414，中宗二十八年五月丙午條。

⁸⁷ 朝鮮·李克增等編，《大典續錄》（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戶典·唐物貿易〉，頁45。

⁸⁸ 朝鮮·慎承善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第9冊，卷88，頁542，成宗九年一月己巳條。

然而如前所述，赴京使行是朝鮮的重要外交工作，清代的燕行使每年平均出訪3次，最頻繁曾一年達13次，⁸⁹明代的固定使行比清代多，數量應不至於更少。赴京使行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以及連年反覆執行的狀況，在制度設計與具體實踐上大體延續前人的作法，鮮有更張，⁹⁰這有利於推論晚明之前的景況。再者，大部分的使節不特別在意醫療議題，相關敘述雖難免散亂零碎，此等不經意的觀察反而較一些涉及明清鼎革、文化認同的論斷信實。⁹¹

管見所及，許震童（1525-1610）的《朝天錄》是實際參與使節團、最早記錄醫員的燕行文獻。明隆慶六年（1572），許震童以正使子弟的名義隨行，他記有一篇〈朝天時同行錄〉，其中載錄醫員李億年的姓名；⁹²合理地推論，李億年負責治療使行成員的患疾，以及購買唐藥。兩年後（萬曆二年，1574），許筠（1551-1588）擔任書狀官（職司監督使行成員，及撰寫報告書），他尚未渡過鴨綠江便染疾不適，滯留平安北道的肅川府附近。許筠以疾留，遂召醫員張彥龍診脈，並服下他開的藥方。⁹³

1656年，位列宗班的麟坪大君李潛（1622-1658）赴京，隨行除「大醫二員」外，還有御醫朴頤、針醫安禮貼身照料。⁹⁴四年後（1600），書狀官李元禎的《燕行錄》留下醫官卜光明檢查藥材的過程。當時朝鮮國王罹患眼疾，使節團急求空青歸國，四處求

⁸⁹ 關於朝鮮使節團的赴京次數，請參見 Hae-Jong Chun,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90-111.

⁹⁰ 韓國學者全海宗考察清代的朝鮮使行團，便注意到整套制度基本上歷有清一代未曾改變，參見 Hae-Jong Chun,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p. 100.

⁹¹ 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中華文史論叢》，2017：2（北京，2017.6），頁147-183。

⁹² 朝鮮·許震童，《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頁335。

⁹³ 朝鮮·許筠，《荷谷先生朝天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6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436。

⁹⁴ 朝鮮·李潛，《燕途紀行》（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2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24。

藥，適有漢人鄭國傾持二顆來售，便是交付卜光明查驗真假。⁹⁵ 1712年，金昌業（1658-1721）在〈一行人馬渡江數〉保存醫員玄翊、御醫金德三的姓名，並細心地記錄使團的兩匹馬，專責載負藥材。⁹⁶一直到1832年，朝鮮使者成員清單，均可見醫員、內醫院貿易刷馬。⁹⁷

綜合官方制度的規範、朝鮮君臣的議論，以及親身經歷赴京使行的日記、報告書，攜帶唐藥製品，同時又是前往中國貿藥的醫員，頻繁往返兩國。他們為解決朝鮮國內的唐藥需求，以及照料使節團人員，成為固定班底，甚至不時有御醫參與其中。這個因應朝鮮內部醫療需求而制定的規範，具體落實的結果是形成一股例常往返中國、朝鮮的醫療資源。貢道沿途的居民注意到朝鮮使節團的醫療資源，尤其是年年造訪的醫生以及隨團準備的藥丸，他們渴望藉此解決自身的問題。

四、作為地方資源的朝鮮燕行使

分析清心丸在清代遼東流行的原因，必須考量到赴京使行的任務編組、使節團的醫療資源，以及貢道沿路基層社會的生活狀況。尤其從漢城到北京的路程，遼寧、冀東的發展狀況本來就不如富庶的江南，加上這一帶自晚明以降，動亂頻仍，是明清交火的熱戰區。在此情況下，年年來訪的朝鮮使節儼然是一股穩定的力量。

朝鮮燕行使的路程依序經過奉天府、錦州府、永平府、順天府，按照地理環境分類，可劃分成遼寧東部山區、遼西走廊，以及冀東地區。⁹⁸這一帶在明代中葉人煙稀少，1488年，朝鮮官員

⁹⁵ 朝鮮·李元禎，《燕行錄》，頁69。

⁹⁶ 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一行人馬渡江數〉，頁290-301。

⁹⁷ 朝鮮·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0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一行人馬渡江數〉，頁299-307。

⁹⁸ 這個分類源自黃普基，《明清時期遼寧、冀東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以《燕行錄》資料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25。

崔溥（1454-1504）的觀察是「通州以東，人煙漸少。過山海關，行百里，僅得一里社，不過二、三草屋」。⁹⁹離開北京近郊的通州，行百里僅得一社，可見居民著實不多。

自嘉靖晚期以降，遼寧、冀東頻遭戰火波及。¹⁰⁰先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1508-1582）入犯，後又有蒙古察哈爾部、滿洲人努爾哈齊（1559-1626）、皇太極（1592-1643）等來襲。天啟元年（1621），清軍攻打遼陽，城破後「驅士民出城恣行屠戮」，這是在東北反覆上演的戰時日常。¹⁰¹無怪乎使者形容沿途所見「人煙斷絕，蓬蒿滿目」，¹⁰²甚至陷入城毀無人的境地。根據黃普基的統計，順天府、永平府在萬曆六年（1578）、順治十八年（1661）的丁數，分別減少 85%、63%，可知朝鮮旅人的記述殆非虛言。¹⁰³

這一片人口、資源本就不豐沛的地域是明清鼎革下的受害者。直到雍正五年（1727），姜浩溥（1690-1778）仍表示錦州一帶「白骨纍纍於荒溪野草之間，冤氣鬱結不散，悽慘愁寂」。¹⁰⁴六年後（雍正十一年，1733），韓德厚（1680-?）也只能以「崩城敗壁，斷柳枯葦，一望蕭然」形容。¹⁰⁵康熙年間（1675-1720），整體狀況方才開始改善。以遼西走廊地區為例，從康熙七年（1668）到乾隆六年（1741），奉天府的人丁平均年增長率是 17.8%，錦州府則是

⁹⁹ 朝鮮·崔溥著，葛振家注，《漂海錄——中國行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頁193。

¹⁰⁰ 戰爭的過程中，不時出現清軍劫掠民人，致使百姓逃散的記述，請參見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269-389。

¹⁰¹ 明·溫體仁等纂，《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8，頁391，天啟元年三月壬戌條。

¹⁰² 朝鮮·李潛，《燕途紀行》，頁59。

¹⁰³ 這方面的計量分析，請參見黃普基，《明清時期遼寧、冀東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以《燕行錄》資料為中心》，〈地名研究〉，頁23-64；同書，〈聚落研究〉，頁65-104。

¹⁰⁴ 朝鮮·姜浩溥，《桑蓬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4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203。

¹⁰⁵ 朝鮮·韓德厚，《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0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199。

14.9%，不復見此前人煙絕跡的景象。¹⁰⁶乾隆五十五年（1790），徐浩修（1736-1799）讚嘆道：「邊塵之不警已百餘年，見今田疇相連，雞犬相聞，晝行夜宿，毫無戒懼。三衛百戰之地，悉變為樂土。」¹⁰⁷顯然該地人口、商業規模在十八世紀末呈現可觀的增長。

清心丸的流行鑲嵌在地方的脈絡，從中央的層面看，朝鮮使節團是邦交的象徵，代表兩個政治中心的交流。然而赴京使行不是一離境便抵達北京，在此之前的50日到60日，他們接觸的是地方官員、士紳與平民百姓。換句話說，燕行使既是「中國」、「朝鮮」之間官方互動的縮影，同時也是朝鮮平安道、黃海道與中國遼寧、山東地區的直接交往；¹⁰⁸更準確地說，是一個經過組織、擁有資源的官方使節團，與相對貧困、有待協助的地方社會的關係。伴隨著清代遼東地方社會逐漸復甦的歷程，朝鮮使節團的醫員與藥丸，日益成為地方百姓競相爭逐的目標。

（一）求醫求藥

我們不能孤立地分析遼東居民求取清心丸的記錄，因為這是該地區長期求醫、求藥的一部分。盡量澄清遼東社會與朝鮮使節團的「醫療互動」，進而深入地方百姓索取清心丸的記述，以及朝鮮下人製作假藥的現象，將有助於說明清心丸在地方上的意義。

晚明以降，遼寧、冀東百姓「攔使求醫、求藥」的例子甚夥。萬曆二年，許筠一行途經廣寧衛（今遼寧省北鎮市）西平堡，「有守堡官姓林者，書其妻病證來求藥」，使團便命醫員張彥

¹⁰⁶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清代中期北方地區人口〉，頁453。

¹⁰⁷ 朝鮮·徐浩修，《燕行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1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387-388。

¹⁰⁸ 從區域史的角度省思東亞文化交流史的討論，參見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6），頁187-218；甘懷真，〈再論東亞作為一種方法〉，收入呂紹理、周惠民主編，《中原與域外：慶祝張廣達教授八十嵩壽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1），頁1-16。

龍前去問診。¹⁰⁹相同的情景在連山驛（今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上演，曾任參將的寧遠衛人線世祿，年初中風，此後雖痊癒七八分，但消化不良，排便艱澀，遂遣家人持禮物而來，「兼致病證書一通，求方及藥物」。結果仍是召張彥龍，請他寫下藥方，順付回禮送之。¹¹⁰張彥龍的意見顯然奏效，隔日下午，線世祿的表姪李守勳送禮上門，並強要使團收下，且表示「參將又欲見醫員」。¹¹¹不通漢語口說的朝鮮醫員，靠著病症書為中國人看診。

直到動亂頻仍的明末清初，「唐人病臥者，求見醫手」仍是朝鮮使者筆下的日常。¹¹²使節團入住北京會同館前，沿途留宿各地的「察院」，¹¹³又稱「朝鮮館」、「柔遠館」。不過地方政府或財力有限，或無心於此，察院往往年久失修，加上使者樂於與地方百姓互動、探聽事情，遂時常借宿民宅。此類承擔接待事宜的戶主，不外乎地方上的富人，畢竟扣除馬夫、下人，具有官方身分的正式使節便達 30 人至 40 人，一般家庭根本無法應付。順治六年（1649）11 月 25 日，仁興君李瑛（1604-1652）一行留宿通遠堡（今遼寧省通遠堡鎮）漢人家中。李瑛是朝鮮王族，隨團配有御醫，臨行前還獲朝鮮孝宗贈送臘藥。¹¹⁴是日，主人之子請求治療父病，李瑛便令內醫前往並施以針灸。¹¹⁵

鎮守邊關的將領、接待使臣的富人並不是唯一求醫、求藥的階層，清朝官員亦不例外。康熙元年（1662），清朝輔政大臣索尼詢問清朝譯官李一善：「朝鮮金尚誠來否？」並要求朝鮮醫官來

¹⁰⁹ 朝鮮·許葑，《荷谷先生朝天記》，頁 140。

¹¹⁰ 朝鮮·許葑，《荷谷先生朝天記》，頁 157。隨行的另一位使者趙憲，留下一致的記載，參見朝鮮·趙憲，《朝天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頁 174。

¹¹¹ 朝鮮·許葑，《荷谷先生朝天記》，頁 159。

¹¹² 朝鮮·金中清，《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11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 409。

¹¹³ 劉為認為察院始於清代，不過萬曆二年許葑便曾記載，記此待考。朝鮮·許葑，《荷谷先生朝天記》，頁 157；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頁 71-72。

¹¹⁴ 朝鮮·李瑛，《燕山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19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 482。

¹¹⁵ 朝鮮·李瑛，《燕山錄》，頁 524。

見。李一善表示：「尚誠不來，而今帶來醫官安禮與尚誠無異。」索尼遂招來安禮，為他診治手臂的患疾。索尼頗讚賞安禮的醫術，他向朝廷陳請，安禮不要隨使團歸國，而是與一位譯官留下，繼續為他診療，最終得到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的允許。¹¹⁶索尼、李一善口中的金尚誠是針醫，安禮則是御醫，滿洲貴族看重這些來自朝鮮宮廷的醫生。

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器之（1690-1722）以子弟軍官的身分隨行，他雖沒有分配到職務，但乃父李頤命（1658-1722）係正使，故能與聞諸多高層消息。11月6日（陰曆），李器之在會同館發現「有官員貌樣者，使從者持毛方席入余房」，原來是「親王之孫問病於金德三」。¹¹⁷不只是親王，會同館顯然開放外人求醫，且聲名極佳。李器之留寓北京期間，結識翰林院庶吉士陳法（1692-1766）。兩人交往相得，在商量如何會面時，李器之說：「尊是官人，無故來此館中似不便。……此有太醫隨來者，此處人多以問病出入，尊亦以問病言於通官而入來可也。」¹¹⁸會同館儼然朝鮮御醫的診療間。¹¹⁹

從晚明到清初，乃至雍正、乾隆年間，清朝官人、平民求見朝鮮醫生，屢見不鮮。雍正五年（1728），親王胤祥（1686-1730）之子「有積年瘡腫，欲邀醫問藥也」，同樣找上朝鮮使節團。於是這

¹¹⁶ 朝鮮·丁若鏞，《事大考例》，卷26，〈雜例考·醫官落留例〉，頁667。

¹¹⁷ 朝鮮·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3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冊2，頁102-103。

¹¹⁸ 朝鮮·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2冊），冊1，頁399-400。

¹¹⁹ 此類例子甚夥，不乏高官顯貴求見朝鮮醫官，如林大材為一位清朝皇族診療，期間非常禮遇，參見朝鮮·李健命，《寒園齋使行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3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367-369。有時甚至只要稍解醫理的使臣也可，如李宜顯稱「胡皇貴臣圖納有病，要見我國醫人。副使裨金重鎰粗解醫術，往見之。」參見朝鮮·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5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400。

一年冬天，醫官金時裕、譯官吳持喆複診數次。¹²⁰越一年（雍正六年，1729），如同索尼的奏請，胤祥向朝廷表示「臣子症候，近延朝鮮國醫官吳志哲調治有效，叩乞恩賜留京調治，俟下次謝恩使臣一同回國」。¹²¹從上到下的重現，可見朝鮮醫官在清人心中的地位。

不過得以趕赴會同館的患者，或是延請朝鮮醫生進屋的人終究少數。對於燕行使而言，尤其是行經貢道沿途，使節團無法久待，攔使求醫才是當地平民的日常。例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李商鳳（1733-1801）因父親李徽中（1715-1786）是此次使行的書狀官，得以子弟軍官的身分隨行。他們行經廣寧縣壯鎮堡歇腳時，一位少年跪在路旁，向使團上呈單子求藥。根據李商鳳的日記可知：

一少年跪進紅色宮牌單子，開視之，書其頭曰：「具廩廣寧縣民張其增稟具，懇恩施藥，以救殘疾事。」又書其面曰：「增祖父常染火症，恐日久為痰。屢聞貴國清心丸，百發百中。恭聞來賓大人賞賜三、兩丸，以救殘喘。不但增祖父啣感，即子子孫孫亦感激不勝，匍匐待命之至。」云。探之囊，唯有一丸，出而與之。店胡又忙取筆、硯，書清心丸三字於片紙而進，對以無。¹²²

張其增的陳述透露幾個重要線索，一是乾隆二十五年左右，清心丸已廣為人知；二是求藥者認為清心丸藥效驚人，百發百中；三是求藥者顯然知道朝鮮使者極有可能施藥，遂有此一舉。事實上從燕行文獻普遍見得清朝人求藥的記載，他的舉動並不特別，索取清心丸在當時並不罕見。按照常理推斷，張其增的例子是朝鮮醫員常見的景況，畢竟使團抵京有日程限制，不可能隨時停留。

¹²⁰ 朝鮮·姜浩溥，《桑蓬錄》，頁114、頁117、頁121。

¹²¹ 朝鮮·丁若鏞，《事大考例》，卷26，〈雜例考·醫官落留例〉，頁668。

¹²² 朝鮮·李商鳳，《北轅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6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冊1，頁266-267。

在這樣的情況下，醫員選擇「施藥」，尤其能夠起到效用的臘藥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二）從官方到民間的擴散

1757年，朝鮮英祖李吟（1694-1776，1724-1776在位）召見參覆使李彝章（1708-1764），彝章曰：「彼人例索我國清心丸，此是藥料酬應，自然浩繁」，並云1748年、1750年，兩任參覆使分別向戶曹領取300粒清心丸，可見清朝方面「例索」清心丸習以為常。¹²³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官員索求的是「好品清心元」、「真品清心丸」，看重的是宮劑，而非使用替代藥材的中品、下品清心丸。¹²⁴明乎此，軍機大臣福長安（1760-1817）、貝子永丹皆求清心丸數十顆，毫不教人意外。¹²⁵事實是自清初以降，朝鮮醫官風靡滿洲皇室、邊將與官員，求醫求藥之例不絕於書。

朝鮮藥物與醫官流行的另一面，是地方社會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晚近的研究已指出，明代中葉以降，即便是富庶的江南，基層社會的官設醫療體系日漸敗壞，承擔醫疾療病責任的是民間醫家，而藥材資源集中於都市，居鄉民眾縱使有錢也難以求醫。¹²⁶這從患者不斷換醫，甚至巫醫並用的傾向，可見醫療資源窘迫的情況，鄉間尤其如此。¹²⁷官方支持的制度性醫療資源全面衰退，北方、遼東地區更形艱難。

朝鮮燕行使連年出訪中國，對於地方而言是一股穩定的力

¹²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第63冊（首爾：探求堂，1969），頁904，英祖三十三年六月十日。

¹²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第2冊（首爾：韓國史學會，1959），頁552，孝宗八年四月十日。

¹²⁵ 朝鮮·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2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142。

¹²⁶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第六章，〈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頁127-154；邱仲麟，〈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收入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337-385。

¹²⁷ 邱仲麟，〈醫生與病人——明代的醫病關係與醫療風習〉，收入李建民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253-296。

量，沿路居民在不同層面向其靠攏，藉此獲取資源、解決自身的問題，實在情理之中。以經濟活動為例，朝鮮使節團必經的豐潤縣，當地人模仿朝鮮使者常用的扇子，「小變其法，骨以班竹、雲竹、棕竹，繪以山水、花卉、翎毛」。藉著模仿朝鮮人的品味，著名畿東。¹²⁸清朝藏書家汪啟淑（1728-1799）亦表示：

豐潤縣所製聚頭扇，凡常行油紙面，遍滿市肆。其佳品糊以高句麗鏡面楮，繪畫人物，五彩絢爛。¹²⁹

清代的「豐潤畫扇」頗出名，但鮮為人知其背後的朝鮮淵源。此外，遼東地方百姓為了迎合朝鮮使者的口味，居民甚至製作類似朝鮮檳葉餅的食品。¹³⁰1765年，洪大容途經高麗堡云：

高麗堡在豐潤縣西二十里，村前有水田，甚粗蕪，猶是東國製作，關內外所未有也。有小米糕，雜以棗肉，亦如東國蒸餅。數十年以前，堡人見我使極其歡迎，享以酒食，自稱高麗子孫。¹³¹

所謂的「高麗子孫」其實是一種宣傳，而非真實的歷史。有意思的是當地居民如何利用朝鮮使者熟悉的物質、論述，販售商品。¹³²總而言之，使節團帶來的商機，使得朝鮮使者與遼東百姓的商販行為成為中朝貢道反覆上演的景色。1780年，朴趾源（1737-1805）在中後所（今遼寧省綏中縣）注意到此處帽鋪專門為朝鮮生產，表示

¹²⁸ 清·吳慎纂修，《（乾隆）豐潤縣志》（清乾隆二十年刊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Rare Book T3134213.83），卷6，〈雜記〉，頁45b-46a。

¹²⁹ 清·汪啟淑，《水曹清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1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頁169。

¹³⁰ 朝鮮·李商鳳，《北轅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6冊），冊1，頁376。

¹³¹ 朝鮮·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2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沿路記略〉，頁235。飲食方面的例子還見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328。

¹³² 關於朝鮮使者如何建構「高麗堡」的意象，請參見黃普基，《明清時期遼寧、冀東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以《燕行錄》資料為中心》，〈地理意象研究〉，頁160-193。

「我國所著毳帽皆出此中」，他不禁感慨「以千年不壞之銀，易三冬弊棄之帽；以采山有限之物，輸一往不返之地」，¹³³清楚呈現一條為朝鮮人而生的產業鏈。¹³⁴

朝鮮使節團作為地方社會的重要資源之一，百姓的商業活動向其靠攏；在醫療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民眾則求見朝鮮醫官，或懇求藥品。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業在寧遠衛與一位清朝儒生王眉祝交流，眉祝代叔父求藥，金昌業遂贈以紫金丸、蘇合丸、九味清心丸。¹³⁵他們在鳳凰城附近時，透過譯官金應瀕，親眼目擊一位滿洲人帶著兒子向朝鮮使者道謝，表示「去年九月生小兒，患急驚風，目直牙堅，嚼清心元灌之便甦，仍得痊可」。這位滿洲人的兒子，有賴清心丸方續命，故稱其神效。¹³⁶

雖然此前的研究已呈現清朝人渴求清心丸的現象，但必須指出的是，地方百姓並不是伊始便知道清心丸的療效，這是一個逐步擴張的過程。順治十年（1653），洪命夏（1608-1667）結識一位中國醫生，洪命夏離開時主動贈送清心丸，此人卻完全不瞭解清心丸。¹³⁷直到頻見求藥記錄的康熙年間，仍不乏不知清心丸者。康熙五十一年，金昌業詢問一位14歲的秀才「清心元曾未聞知否」，少年也答以不知。¹³⁸不僅是清朝的醫生、秀才，康熙年間的官員、僧人、滿洲人，乃至平民，未曾聽過清心丸者，不乏其數。¹³⁹值

¹³³ 朝鮮·朴趾源撰，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卷2，〈駟汎隨筆〉，頁80-81。

¹³⁴ 關於朝鮮使節團的商業活動，及中國方面相應的產業鏈，請參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使行貿易〉，頁61-166。

¹³⁵ 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3冊），頁328。九味清心丸與牛黃清心丸不同，特此說明。

¹³⁶ 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3冊），頁454。

¹³⁷ 朝鮮·洪命夏，《甲辰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0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293。

¹³⁸ 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457。

¹³⁹ 此類例子甚夥，僅舉金昌業、李器之所見為證。參見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393-394；朝鮮·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

得注意的是進入乾隆年間，貢道沿途，無人不知清心丸，這或許與當地社會經濟的狀況復甦有關。¹⁴⁰

（三）造假作偽

著名的燕行使洪大容曾云：「清心丸頗有奇效，而品亦多等。假者過半，其真者則只出於宮劑，此最可用。北京人甚珍此物，雖明知其假而求之不已，似亦略有效耳。」¹⁴¹意即真品清心丸出自宮中調製，而偽藥在當時並不鮮見，且頗有市場。1783年，李田秀（1756-1795）明言，清心丸「易帶、易售，尤為便用」，初遇中國人，「一出給之，不問真假，笑容可掬」，但近來帶去中國的清心丸「無一真品，只有外衣之金箔而已」。¹⁴²藉此牟利者多是朝鮮百姓，他們發現清朝人求藥若渴，遂製作假藥。例如鄰近遼東的朝鮮平安道居民，通常是隨使節團出行的侍從，其中多有以造清心丸致富者。¹⁴³

赴京使行的下人多擇定平安道百姓，他們頻繁往來漢城、北京之間，熟知中國事情。朴齊仁描述得清清楚楚，「此人輩之期欲從行，非但為是應下銀兩，始於越江之時，賣取清心丸於義州等處。每丸直文不過一文，半塗染銀箔，強曰清心丸，而其實不知為何物」。他們皆為販賣「偽清心丸」而來，那怕只是陳根腐草和著泥巴，也能牽得一匹「韃馬」歸鄉，堪稱穩賺不賠的無本生意。¹⁴⁴李田秀亦云：「西路之人，多有以造清心丸致富者。」說的便是這些販售假藥的朝鮮民人。¹⁴⁵

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2冊），冊1，頁101、頁199、頁409。

¹⁴⁰ 黃普基，《明清時期遼寧、冀東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以《燕行錄》資料為中心》，〈聚落研究〉，頁65-104。

¹⁴¹ 朝鮮·洪大容撰，鄭健行點校，《乾淨術筆談》，頁70。

¹⁴²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冊下，頁402。

¹⁴³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冊下，頁403。

¹⁴⁴ 朝鮮·朴齊仁，《燕槎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6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頁332。

¹⁴⁵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冊下，

朝鮮使者知道偽藥的存在，李田秀在瀋陽與一位名士張裕昆交遊，曾提醒道：「近來我人帶來買賣之清心丸，多是不好的，不可輕服。」而他送上的乃「親手製來，並無此慮」。¹⁴⁶李田秀是正使李福源（1719-1792）的姪子，與聞機要，表示「今行則御賜清心丸五劑四百丸，吾躬自監製」。強調此次使行的宮劑清心丸，係精心監造的成品，無怪乎稱「並無此慮」。

真品清心丸得之不易，洪大容的叔父洪櫓（1722-1809）擔任使行團的書狀官（負責監察上下、撰寫見聞報告書），當他贈送嚴誠清心丸時，便提醒此物在朝鮮國內「亦寶貴之極，無從購求者也」。¹⁴⁷上品宮劑如此珍稀，朝鮮國內自然不乏私自調配者，但因為替換藥材，殊失效用，良藥反成毒品。清朝人深知清心丸有真有假，「必以使臣橐裏所得為真品」，¹⁴⁸然而朝鮮官方賞賜有限，使臣也不可能全部隨身攜帶，結果是作偽的市場歷久不衰。

直到晚清，假藥仍層出不窮，李承熙（1847-1916）云：「近有莠賈，淆劣材粧其外，售之，丸乃不靈。」藥效失常的原因是清心丸「需材必精，惟人蔘、牛黃、大豆黃卷三種，產韓地者良，由是韓製名天下，材上者須十元，最下猶幾一元」。¹⁴⁹上品清心丸需費良材，不容易取得。1836年，任百淵（1802-1866）一行留宿東八站附近，隔日早上，宅主向任百淵求藥：

店主攜其稚來求丸藥。余指其兒問曰：「你的兒子？」曰：「是。」曰：「你要甚麼丸藥？」曰：「清心丸、蘇合

頁403。

¹⁴⁶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冊下，頁271。

¹⁴⁷ 清·朱文藻編，劉靖點校，《日下題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37。洪大容的相關文獻，被研究者視為感情真摯，質量上乘的文獻，少有諱飾之處。相關討論參見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朝鮮燕行士人與清朝儒生〉，頁157-187。

¹⁴⁸ 朝鮮·朴齊仁，《燕槎錄》，頁335。

¹⁴⁹ 朝鮮·李承熙，《大溪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058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冊4，卷29，〈清心丸說〉，頁532。

丸。」曰：「誰要喫？」曰：「我的兒媳婦有心痛耳。」即以數丸與之，曰：「這是狠貴的。」彼亦點頭，曰：「狠貴，狠貴。」¹⁵⁰

根據這一段對話，朝鮮、清朝人皆知清心丸所費不貲。儘管任百淵沒有明言，但這想必是源自宮劑的真品清心丸，而非泥丸捏造的假藥。

中國人不是單純地被騙，也逐漸明白吃欺受騙，吞下假藥，他們有時氣得破口大罵。李商鳳在北京觀覽佛寺，贈與僧人兩粒清心丸，他卻不接受，說道：「爾們肚裡，俺所未透，安知不以黃土塗金而謾吾們。」¹⁵¹李商鳳也曾被民人揶揄：「見賣於爾們人亦已多矣，今可復乎？此乃團黃土為丸，外塗金箔者也。」¹⁵²可見假藥橫行。趙秀三（1762-1849）形容清心丸是協助他們遊觀的利器，「莫到重關飛不過，開門亦借一丸泥」，指出中國人多要清心丸，但「丸是泥造者」。¹⁵³清朝人受騙日久，辨別偽藥的技術應時而出。具體方法是將清心丸握在掌中，「掌有涼意則稱善」，不過其實毫無用處，只是道聽塗說。¹⁵⁴

1816年，李肇源〈清心丸歌〉云：「韓人不曾為珍異，中國一辭稱神丹。」¹⁵⁵李肇源是典型的兩班出身，祖上三代都是官員，他則是1792年的狀元。在1816年燕行以前，李肇源官至漢城府的判尹（正二品），不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吏。對他以及其他朝鮮使者

¹⁵⁰ 朝鮮·任百淵，《鏡活遊燕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第134冊，首爾：尚書院，2008），頁82。

¹⁵¹ 朝鮮·李商鳳，《北轅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6冊），冊1，頁504。

¹⁵² 朝鮮·李商鳳，《北轅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7冊），冊2，頁110。

¹⁵³ 朝鮮·趙秀三，《秋齋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76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冊1，卷5，〈詩·出關〉，頁384。

¹⁵⁴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冊下，頁404。

¹⁵⁵ 朝鮮·李肇源，《黃梁吟》，〈清心丸歌〉，頁311。

而言，朝鮮王室賜下的清心丸實屬珍貴，但絕非甚麼難得之物，因為這是朝鮮使者的隨身盤纏。¹⁵⁶與其將〈清心丸歌〉作為詮釋清心丸流行的原因，不如思索其間透露的競爭心態——一種朝鮮中心主義的驕傲，¹⁵⁷以及地方百姓的實際需求。

至此，關於清心丸是否為「假藥」的問題，整個論述的因果關係應為：清心丸確實具備療效→人們注意到它的療效，開始生產偽藥→市面上出現偽藥。而不是：有人製作了清心丸並吹噓它的療效→更多人開始相信，進而製作假藥。根據本文提供的例子，梳理清心丸的假藥問題，首先必須注意到清心丸分成幾種等級，上品宮劑最為有用，然數量有限。其次是這種具有療效的宮劑，清朝民人（朝鮮國內亦同）取得不易，導致朝鮮使節團的隨從製作假藥騙人。論及清心丸的療效，有的正面肯定，有的直斥假藥，實乃他們筆下的「清心丸」並不一致，有者是宮劑，有者是使用替代藥材的中品清心丸，有者則是朝鮮下人偽造的假藥。明乎此，便能解釋史料之間的矛盾，因為「清心丸」是一個複數詞。

總而言之，將時間、空間納入考量，朝鮮清心丸在清代遼東的流行並不偶然，而是鑲嵌在地域的必然。這顆收貯朝鮮使者囊中的藥丸，見證了遼寧地區的日漸興旺，逐漸成為競相爭求的物什。歷經明清鼎革的動亂，東北一帶人煙稀少，人口增長實在康熙年間之後。隨著商業活動、城鎮規模的壯大，固定來訪的朝鮮使節團儼然一股穩定的資源，引起當地百姓注目。使者隨身的藥品源自外國，卻是地方例行可得的資源。直到十八世紀後，朝鮮國內出現新趨勢，人參逐漸取代清心丸，其重要性方才不復以

¹⁵⁶ 清心丸作為朝鮮使者的盤纏，例見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338；朝鮮·李商鳳，《北轅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6冊），冊1，頁100。

¹⁵⁷ 張伯偉指出，朝鮮使者為了彰顯自身的地位，時有「失實」的斷語。參見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頁147-183。

往。¹⁵⁸

五、結語

朝鮮使者時常嘲諷、鄙視清朝人求取清心丸的醜態。洪大容在山海關一帶遊觀，曾想上城一覽，「主者鎖門，固要清心丸，不與則咆哮不肯開」。見此景況，洪大容不禁感嘆「大國人品可知也」。¹⁵⁹朴趾源的經驗更為惡劣，一位路旁販賣甜瓜的老者「故作可憐之態，要得清心丸」。甚至緊抱隨行使者的腰，強要買瓜。¹⁶⁰朝鮮燕行使面對此類難以計數的舉動，形容道：「沿路店站中，婦女、幼兒，及觀光處僧徒、遊客，與夫關中朝班、裏朝士大夫，不計修人事與否，必就使臣面前求索大人真真的高麗清心丸。」¹⁶¹絕非過份誇大的斷語。

前人研究將清心丸的流行，歸諸清朝人崇洋媚外的心態，以及朝鮮人的詐欺手法，否認其具有療效，認為只是普通藥丸。本文梳理清心丸在朝鮮國內的使用狀況，強調清心丸具有不同品級，而上品宮劑乃朝鮮救急名藥，¹⁶²上到朝鮮國王、將軍，下到百姓，乃至由朝鮮遣返歸國的清朝百姓，皆曾施以清心丸搶救。清心丸價高難得，朝鮮民眾無力負擔名貴的藥引，不惜替換藥材調製清心丸，結果是失去療效，無甚用處。

清心丸的品級像是一張光譜，一邊是上品宮劑，一邊是殊失藥效甚或可能危害健康的假藥。清心丸是「複數」而非「單數」，儘管文獻上全都表述為同一詞彙，朝鮮官方、士人，以及求藥的清朝人常指名索討的是真品、上品、「真真的清心丸」，因為「清心丸頗有奇效，而品亦多等。假者過半，其真者則只出於宮劑，

¹⁵⁸ Seong Kim Su, "From Woohwang Cheongsimwon to Ginseng -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Use in the Joseon Era -," pp. 169-172.

¹⁵⁹ 朝鮮·洪大容，《湛軒燕記》，頁272。

¹⁶⁰ 朝鮮·朴趾源撰，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卷1，〈盛京雜識〉，頁53。

¹⁶¹ 朝鮮·朴齊仁，《燕槎錄》，頁335-336。

¹⁶² 韓國的醫療史家申東源也認為清心丸在朝鮮王朝時代是救急名藥。參見申東源著，任正嫻譯，〈救急名藥·牛黃清心丸〉，頁215-224。

此最可用」。¹⁶³顯見製作清心丸之難，及朝鮮官方調製的宮劑確實得之不易。

宮劑即臘藥，係朝鮮官方在農曆 12 月，循例由內醫院為首的衙門調製的藥品。自朝鮮名醫許浚的《彥解臘藥治症方》以降，牛黃清心丸始終是臘藥之首。此類收貯內醫院的名藥，由該單位監督製作。內醫院是朝鮮王朝醫療體系的中心，掌握地方各道上貢的藥材，並派遣醫官、御醫，連同赴京使行前往北京，採購唐藥材。朝鮮醫生治療使行成員的藥品如清心丸，其中一部分即源自使節團買回的唐藥材。

聚焦在朝鮮使節團身上，這是一種基於國際政治而生的聯繫，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然而從地方的角度審視，不如理解為兩個區域之間的交流。本文指出，朝鮮赴京使行是經過組織、充滿菁英與技術人才的編制，參與成員不乏高官顯貴、王族貴胄。他們的醫療資源自然不虞匱乏，早在明萬曆年間（1609-1620），向使團求醫求藥者不在少數。隨行朝鮮醫者的技術，有時更是為清朝皇室看重，頻頻出入紫禁城與親王宅邸。清朝官方也曾下旨，令朝鮮醫官留下為清朝官員看病。顯然朝鮮醫生在遼東、北京名氣不小，向此些為朝鮮國王看病的人求診，極其正常。

探討清心丸流行的原因，不應在「國家」的框架下尋找答案。清代遼東不是「韓醫」、「中醫」一較高下的競賽場，遼寧、冀東不僅屬於「中國」，也鑲嵌在一張緊鄰朝鮮的地緣網絡中。立足地方社會的邏輯與需求，才能發現清心丸風行的原因。對於明末清初以降，動亂頻仍的遼寧、冀東一帶，固定連年來訪的朝鮮使節團，是這塊貧弱土地珍貴、穩定的資源。遼東地區發展出「朝鮮特色」的商業化傾向，正源於朝鮮使節團為中心的地緣網絡。地方民眾向朝鮮醫生求醫、求藥，史不絕書，而此類旨在探聽情報、詢問國情的朝鮮使者，¹⁶⁴自然樂得在問話後贈送幾粒真

¹⁶³ 朝鮮·洪大容撰，鄭健行點校，《乾淨衛筆談》，頁70。

¹⁶⁴ 關於這方面的議題，學界已經累積豐厚的成果，參見張存武，〈朝鮮對清外交機

真的丸子。

或許有人主張傳統的韓國醫學比不上中國漢醫學，僅以朝鮮醫學的代表性著作《東醫寶鑑》為例，中國大陸學者指出其中 90% 以上的內容輯錄自中國作品，認為該書絕非原創性的成果。¹⁶⁵既然韓醫肯定比不上漢醫，朝鮮人怎麼可能製作出比清代中國更好的藥物？將分析問題的視界上升到國家的層次，在簡化問題、收束材料、做出整體評價上的好處顯而易見，卻等同忽略文化交流的執行面，往往是兩個區域間的相互對話，而非單方面的強勢傳播。遼東一隅的問題，實非清朝、朝鮮兩國的角力場。

論起朝鮮醫學在清朝的影響，根據朝鮮使者的見聞，朝鮮官方刊行的《東醫寶鑑》、《濟眾新編》盛行於北京書肆。朴趾源便驚訝道：「我東書籍之八梓於中國者甚罕。獨《東醫寶鑑》二十五卷盛行，板本精妙。」¹⁶⁶金景善（1788-1853）亦云：「醫技以《東醫寶鑑》為珍，書肆之刊行久矣，且有《濟眾新編》云。」¹⁶⁷加上前述朝鮮醫員寓留北京期間，不乏民人與官員求醫、求藥，朝鮮醫學在清代遼東、北京實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使節團往返漢城、北京沿路地區，自明末清初以降動盪不斷，醫療資源匱乏，上品清心丸不待言，那怕等而下之的凡品也具備一定的競爭力。畢竟朝鮮使節團隨行的醫員，不乏替朝鮮國王診療問疾的宮醫，不是隨處可見的走方醫。可惜中國史料不足以探討此問題，有賴挖掘朝鮮使者的記述才能捕捉到此現象。

密費之研究》，收入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86-146；伍躍，〈朝貢關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ふるに際して〉，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185-220；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収集〉，《漢學研究》，29：3（臺北，2011.9），頁155-190；丁晨楠，〈16-17세기 朝鮮燕行使의 중국 通報 수집활동〉，《한국문화》，79（首爾，2017.9），頁165-201。

¹⁶⁵ 黃英華、梁永宣，〈中國對《東醫寶鑑》的認識和研究〉，《中醫文獻雜誌》，2014：5（上海，2014.10），頁56-61。

¹⁶⁶ 朝鮮·朴趾源撰，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卷4，〈口外異聞〉，頁293。

¹⁶⁷ 朝鮮·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2冊），卷6，〈留館別錄〉，頁371。

最後，層出不窮的造假作偽，其實證明清心丸具有療效，重點是區別「上品」的宮劑與「下品」的偽藥。朝鮮下人捏著泥土與陳根腐草，裹上銀箔或金箔，佯稱是清心丸，四處兜售。根據1800年朴齊仁的觀察，此種無本生意頗有市場，也確實運用詐欺手段。這種現象應該是清心丸流行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畢竟鮮少有人偽造沒有名氣的藥品。相反地，證諸本文提供的例子，凸顯清心丸具有療效，惟真品難求而已。明乎此，朝鮮使者觀察到清朝人「每多不信其為真者」，¹⁶⁸其實反映的是中國人「相信」清心丸，清朝人「知此藥之有真有假，下人輩所賣，雖不得不買取，然必以使臣橐裏所得為真品」。¹⁶⁹

直到清末民初，清心丸風行依舊，李承熙云清心丸「需材必精，惟人蔘、牛黃、大豆黃卷三種，產韓地者良，由是韓製名天下。材上者須十元，最下猶幾一元，售之中華北京，每三倍，號高麗丸」。¹⁷⁰上等良材調製者，與最下品價差10倍，可見時迄二十世紀末，真品仍不是人人得以負擔的平民急救方。清心丸是朝鮮客人帶來的禮物，同時也是商品、貨幣，而亦不可忽視其療效。這顆易帶易售的藥丸，在清代成為貢道沿路百姓口中的起死神丹，以及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賞賜官員的禮品。¹⁷¹清朝百姓求取清心丸的歷程，必須從他們的需求挖掘真相，進而透過朝鮮使者的眼睛，探訪清代遼東的在地故事。

（責任編輯：王亭方 校對：林晉葳）

¹⁶⁸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冊下，頁403。

¹⁶⁹ 朝鮮·朴齊仁，《燕槎錄》，頁335。

¹⁷⁰ 朝鮮·李承熙，《大溪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058冊），冊4，卷29，〈清心丸說〉，頁532。

¹⁷¹ 清·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247，頁23b-24b，乾隆五十一年正月甲戌條。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一）中國史料

宋·太平惠民和劑局編，劉景源點校，《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

明·李梴著，金媽莉注，《醫學入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明·龔信纂輯，龔廷賢續編，羅青江整理，《古今醫鑒》，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

明·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明·溫體仁等纂，《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朱文藻編，劉靖點校，《日下題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清·吳慎纂修，《（乾隆）豐潤縣志》，清乾隆二十年刊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Rare Book T3134213.83。

清·汪啟淑，《水曹清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1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二）朝鮮、日本史料

朝鮮·丁若鏞，《事大考例》，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

朝鮮·尹昉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

朝鮮·戶曹編，《唐藥材契變通節目》，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筆寫本，1856，收藏記號奎19337。

朝鮮·任百淵，《鏡浯遊燕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第134

- 冊，首爾：尚書院，2008。
- 朝鮮·朴趾源撰，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
- 朝鮮·朴齊仁，《燕槎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6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李元禎，《燕行錄》，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2016。
- 朝鮮·李文樞，《默齋日記》，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41輯，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98。
-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首爾：東國文化社，1959。
- 朝鮮·李克增等編，《大典續錄》，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
- 朝鮮·李芑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
- 朝鮮·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5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李承熙，《大溪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055-106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 朝鮮·李秉模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8。
- 朝鮮·李健命，《寒圃齋使行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3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朝鮮·李商鳳，《北轅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6-17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朝鮮·李景奭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孝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
- 朝鮮·李滄，《燕途紀行》，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2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李瑛，《燕山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19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李遇駿，《夢遊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5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李肇源，《黃梁吟》，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61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 朝鮮·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12-13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朝鮮·奇自獻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
- 朝鮮·孟思誠等修，《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
- 朝鮮·金中清，《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11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金在魯等編，《續大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8。
- 朝鮮·金昌集等修，《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7。
- 朝鮮·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2-33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金指南、金慶門等編纂，《通文館志》，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
- 朝鮮·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0-72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金邁淳，《洌陽歲時記》，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主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1 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 朝鮮·姜浩溥，《桑蓬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14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 朝鮮·柳相弼，《東槎錄》，收入民族文化促進會編，《海行摠載》，第 10 冊，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
- 朝鮮·柳得恭，《京都雜誌》，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主編，《韓國漢

- 籍民俗叢書》，第 1 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 朝鮮·洪大容撰，鄭健行點校，《乾淨衙筆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朝鮮·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洪命夏，《甲辰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0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洪錫謨，《東國歲時記》，收入任東權、李元植、婁子匡主編，《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1 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 朝鮮·洪錫謨等著，姜在彥譯注，《朝鮮歲時記》，東京：平凡社，1971。
- 朝鮮·徐命膺，《考事新書》，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3 輯》，子部第 11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 朝鮮·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2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徐浩修，《燕行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1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崔溥著，葛振家注，《漂海錄——中國行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 朝鮮·康命吉，《濟眾新編》，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1 輯》，子部第 2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朝鮮·許浚，《臘藥症治方諺解》，首爾：大提閣，1985。
- 朝鮮·許浚著，郭靄春注，《東醫寶鑑》，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 朝鮮·許筠，《荷谷先生朝天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6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 朝鮮·許震童，《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 朝鮮·魚叔權，《考事撮要》，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3輯》，子部第10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朝鮮·慎承善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

朝鮮·趙秀三，《秋齋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769-77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朝鮮·趙憲，《朝天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朝鮮·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24輯，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文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6。

朝鮮·鄭麟趾等修，《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

朝鮮·韓德厚，《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0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

朝鮮·禮曹典客司編，《典客司日記》，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各司謄錄》，第92-101冊，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99。

朝鮮·禮曹典客司編，《邊例集要》，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16輯，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1974。

荒川五郎，《最近朝鮮事情》，東京：清水書店，1906。

金健瑞、李思恭、林瑞茂等編，李漢紀、李哲懋、吳致默等增補，《增正交鄰志》，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首爾：探求堂，196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備邊司謄錄》，首爾：韓國史學會，1959。

朝鮮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編，《李朝實錄·高宗實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二、近人專書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

- 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 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 黃普基，《明清時期遼寧、冀東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以《燕行錄》資料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 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 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 三木栄，《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1991。
- 山本進，《大清帝国と朝鮮經濟——開発・貨幣・信用——》，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2014。
- 田川孝三，《李朝貢納制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64。
- 田代和生，《江戸時代朝鮮藥材調査の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9。
- Suh, Soyoung. *Naming the Local: Medicine, Language, Identity in Korea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三、近人論文

- 刁書仁，〈明代朝鮮使臣赴明的貿易活動〉，《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長春，2011.6，頁 73-79。
- 甘懷真，〈再論東亞作為一種方法〉，收入呂紹理、周惠民主編，《中原與域外：慶祝張廣達教授八十嵩壽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1，頁 1-16。
- 李春梅，〈《燕行錄全集》中的醫學史料研究〉，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李曉華，〈《紅樓夢》中宮廷錠子藥賞賜之俗考〉，《紅樓夢學刊》，2016：

- 4，北京，2016.7，頁 289-299。
- 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29：3，臺北，2011.9，頁 155-190。
- 邱仲麟，〈醫生與病人——明代的醫病關係與醫療風習〉，收入李建民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253-296。
- 邱仲麟，〈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收入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 337-385。
- 張存武，〈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收入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86-146。
- 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中華文史論叢》，2017：2，北京，2017.6，頁 147-183。
- 陳明，〈「吸毒石」與「清心丸」——燕行使與傳教士的藥物交流〉，《中華文史論叢》，2009：1，北京，2009.3，頁 311-346、頁 398。
- 陳明，〈「醫藥反求之於東夷」——朝天使與燕行使旅程中的醫事交往〉，《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4，北京，2013.2，頁 77-102、頁 478。
-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6，頁 187-218。
- 黃英華、梁永宣，〈中國對《東醫寶鑑》的認識和研究〉，《中醫文獻雜誌》，2014：5，上海，2014.10，頁 56-61。
- 裴英姬，〈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 劉序楓，〈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故宮學術季刊》，23：3，臺北，2006.9，頁 91-126。
- 劉淑芬，〈戒律與養生之間——唐宋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藥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臺北，2006.9，頁 357-400。
- 田代和生，〈「鎖国」時代の日朝貿易——銀の路・絹の路——〉，《經濟史研究》，14，大阪，2011.1，頁 1-24。
- 申東源著，任正燮譯，〈救急名藥・牛黃清心丸〉，收入申東源著，任正燮

- 譯，《コレラ、朝鮮を襲う：身体と医学の朝鮮史》，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5，頁 215-224。原文初出：申東源，〈臘藥，『언해납약증치방』，그리고 허준〉，《한국의사학회지》，13：2，首爾，2000.11，頁 23-28。
- 申東源著，任正燮譯，〈内医院・典医監・惠民署はどのような所だったのか〉，收入申東源著，任正燮譯，《コレラ、朝鮮を襲う：身体と医学の朝鮮史》，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5，頁 177-199。
- 伍躍，〈朝貢關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185-220。
- 丁晨楠，〈16·17 세기 朝鮮燕行使의 중국 通報 수집 활동〉，《한국문화》，79，首爾，2017.9，頁 165-201。
- 金泰俊，〈18 세기 燕行使의 思考와 자각——《熱河日記》를 중심으로한 여행자 文學론——〉，《明大論文集》，11，首爾，1978.12，頁 151-179。
- 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綜考〉，《震檀學報》，29、30，安養，1966.12，頁 435-480。
- Chun, Hae-Jong.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90-111.
- Kim, Seong Su. "From Woohwang Cheongsimwon to Ginseng -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Use in the Joseon Era -."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6 (Aug, 2017), pp. 147-180.

Liaodong Society and the Popularity of Cheongsimw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u, Cheng-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y *Cheongsimwon* (清心丸), a medicinal product used in Chosŏn medicine, became such a hit in Liaodong socie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highest grade of Cheongsimwon, which came in the form of a pill and was prepared by the Chosŏn government during the twelf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was extremely popular with the aristocracy and commoners alik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took it with them during their visits to Beijing, where it was well received by Qing officials and commoners. Using a social histor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Cheongsimwon in Chosŏn society, the medical unit of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and the demand in Liaodong society for Cheongsimw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Chosŏn accounts,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a part of the reality of Liaodong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ries to explain why there was such a need in Liaodong for *Cheongsimwon* during this time.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after pointing out that both commoners and official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regarded Cheongsimwon as a medicine with excellent curative powers, I investigate the demand for the medicine among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society. I then describe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heongsimwon, as well as the materials that went into the making of a Cheongsimwon pill. The second section focuses on the medical resources of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the role play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medical personnel on the missions, and

*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envoys' purchase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áng yào* 唐藥). The third part is a diachronic reflec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heongsimwon to residents along the tributary rou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society in Liaodong.

Keywords: *Cheongsimwon*, China Mission Record, Sino-Chosŏn History, *Liaodong* societ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